

两浙女性文学： 由传统而现代

付建舟 / 著



SHUXI

YANJIU

WENHUA

YU

WENXUE

LIANGZHE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WENXUE

YU

两浙女性文学： 由传统

WENHUA

付建舟 / 著

YANJIU

SHUX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浙女性文学：由传统而现代/付建舟著.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1.12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5161-0378-4

I. ①两… II. ①付…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浙江省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76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4577(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 现代化进程

地域文学研究，作为侧重从地域文化视野中透视特定地域文学的独特质地、品格和独创性成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① 在地域文学视阈内，由两浙文化传统孕育的“两浙文学”，应是中国各地域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之一。它地域形态完备，历史积淀深厚，尤其在近现代获得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是，探讨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此总结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审视“两浙”和“两浙文学”的概念形成，从地理学、行政区划、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考量，它经由历史的沿革而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所谓两浙，通常是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隔成两块：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历史形成的“两浙”概念，起

^①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和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1998 年版丛书卷首。

源颇早，唐代就置“两浙道”，宋时改称“两浙路”，可见“浙江”之称谓早就置于典籍，说明它在中国的省域建制中是渊源颇久的。不过那时的两浙地域，范围较广，相当于今日的“小江南”之说。唐时的“两浙道”，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江西道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茅上以东、浙江新安江以北地区，^①它虽然囊括了浙江全境，但毕竟有较大的区域延伸。基于如此区域划定，历史上的“两浙文化”和“两浙文学”，应是包括今浙江、上海、苏南、皖南等地的区域文化和文学，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江南”文化和文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复杂构成，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文化/文学的多样形态（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浙东文学和浙西文学），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研究“两浙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便是研究“江南文学”，产生在以浙江为主要地域的“两浙文学”也便有了更开阔视野、更深广内涵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当然，历史上所说的“两浙”地域和“两浙文学”，也并非全是“小江南”意义上的，也应有浙江自身的特指性。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浙江独立建省，“两浙”之称单指浙江一地的意义逐渐趋于明晰，“两浙文学”也就有了浙江自身的独特内涵。浙江以省建制，始于元明之际，那时的“两浙”称谓，也就不再有涵盖“小江南”的意义。清乾隆年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卷1载：

元至正二十一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史。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

^①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①

至是，“两浙”遂有了确切的地域界定，而且从划定的区域看，元明清时期“以省称”的“两浙”已完全同于今天所说的浙江了。由是观之：以“两浙文化”和“两浙文学”单指浙江的文化/文学传统，有着史乘的依据，特别是在中国晚近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其蕴涵的“浙江”指向就越来越明确。因此，当我们今天研究浙江的文化和文学，探究其历史继承性和提供的历史经验时，就不能不谈“两浙”文化/文学传统，用“两浙文学”称说浙江文学的前后传承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也是有相当合理性的。而且从文学的传承关系看，“近传统”对当今文学的影响显然要大于“远传统”，20世纪十分辉煌的浙江新文学便主要是在承续晚近的“两浙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发展的，如此说来，具有单独指向的“两浙文学”的研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我们这里研究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所说的“两浙文学”，就包容两层含义：“小江南”意义上的“两浙文学”和单指浙江的“两浙文学”，而又以后者为重。因为探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深层的文化积淀固然需要用力开掘，但对于“现代”更具观照意义的“近传统”文化经验更应予以特别关注。探讨两浙人文传统孕育的历史经验，可以追溯很远，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是对其的恰切赞誉，但就推动浙江文化的发展并使之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深刻影响而言，却主要是在南宋以后确立“文化中心”地位以来。这样，单纯“浙江”意义上的“两浙文学”内涵就十分显豁。从这一视角切入，探究区域文学现象同区域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由此研究区域文化对文学现代进程的推动意义就非常显著：诸如探讨历史上三次文化中心南迁对造就南宋以来两浙文学特别繁盛的意义，论证两浙地区日益浓厚的启蒙文化思潮对中国文学的

^① 参见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近现代转型意义以阐明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沿海地域作家的外向拓展意识所呈示的汲取文学思潮多样性与建构文学创新传统等。这既是对地域文学传统研究的一种深化，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探寻，有助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层揭示。因此，就总结浙江的传统文学经验而言，可以取“江南文学”视野，但更值得关注的应是晚近的“两浙文学”观念。

探讨历史积淀的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往论说文学的现代性，总是外来思潮影响论占据上风，对传统与文学现代性关系的研究虽已有所触及，但尚未深入，特别是缺乏从一个特定地域的实证论析中把握传统文化思潮对文学发展进程的推动。就此而言，两浙文学的研究价值恰恰得以呈现，因为它可以为此种关系的论述提供最具典型意义的实证。两浙文学资源丰厚，不仅反映在传统文学深厚积淀上，同时也体现在新文学资源极其丰富上。南宋以来的两浙文学固然已引领中国文学的潮流之先，五四以来的浙江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有显赫的地位，以鲁迅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阵容壮观、成就斐然，且往往引领了中国新文学潮流，因此历来有浙江作家写了“半部中国新文学史”之称。研究此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现象，探究两种文学各自的成因及其前后传承、递进、发展的趋向，无论是就总结浙江文学自身经验还是由此观照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而言，都有极重要的价值。

对于此种价值的论定，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仅就立足于浙江研究地域人文传统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并由此及于对整体文学的观照，至少具有以下两重意义。一是研究传统文化思潮对于深化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确立人的近现代理性，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及其思维方式的改变，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从而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思想的近现代化发展开辟道路。而确立这一目标，正是启蒙文化思潮所

关注的重点。因而，考量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研究启蒙思潮的演进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这一话题的缘由所在。中国启蒙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外来思潮的影响，也有“传统内”近代理性的日渐积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对此作出恰当的梳理与描述，并寻绎出与之对应的文学发展经验，对于深化中国文学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两浙文学”层面上，就可以找寻出这样的对应关系，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启蒙文化思潮延续、对接过程，从中探讨文学领域里现代与传统的承传关系，揭示现当代文学充分吸取中国古代文学精神资源以推进文学的现代进程，就能为重构民族文学传统并走向现代与世界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二是总结浙江文化传统深化浙江文学研究的意义。就浙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其在全国取得优势地位，主要是在南宋以后，到新文学时期，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相当长时期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原因就在于积淀深厚的两浙文化传统提供了历史基因。其中启蒙思潮对推进中国文学现代化，从近代至五四新文学时期，都是非常突出的。浙江涌现的一批启蒙文学大师，从近代的龚自珍至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周氏（树人、作人）兄弟等，既弘扬两浙启蒙文化传统，又融合世界启蒙文化潮流，在创建中国新文学中取得了别人无可取代的地位与贡献。因此探讨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浙江传统”就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把握浙江的基本内涵及其复杂构成，揭示其对文学的近现代转型所产生的作用，就能够清晰展示浙江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这对于在文学领域内总结和弘扬“浙江精神”是颇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

研究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思索与探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探讨两浙人文传统的生成背景，梳理其发生、发展及深化、变异过程，研究它对于促进浙江地域文学及其对中国整体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意

义。还可论及人文传统、启蒙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几种文体、文学类型在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与意义，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较为全面、系统地把握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探讨它对浙江文学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等。有鉴于此，我们拟在下述命题上作出初步的探索。

(1)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整合研究。这是对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种重要文学现象的梳理与描述，是以两浙文学作为典型例证讨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阵容壮观、成就卓著。而且，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正是他们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创造了辉煌业绩，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我国由五四开创的现代文学优秀传统中，浙江作家所提供的宝贵经验正是它最突出的部分之一；而他们在各个文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也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缩影。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浙江潮”现象，其意义不只是在揭橥地域文学经验的层面上，以此为切入口，的确可以在地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深挖出许多于总结中国新文学发展规律极具观照意义的东西。文学群体的形成，是一定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又因群体合力的形成对特定文学思潮起重大推动作用，乃至影响整体文学格局的建构。浙江作家群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融通世界文化新潮的现代观念，总是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思潮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系统论述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当有利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深化。从这个视角论述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侧重在对群体的细部结构的描述，即展示在中国新文学背景下形成的七个作家群：浙东乡土作家群、“湖畔”诗人群、“白马湖”作家群、“语丝”作家群、浙东左翼作家群、“现代”作家群、战时浙江作家群。对每个作家群的论述，大都叙述其生

成背景、成员构成、思想与创作倾向、文学创作的独特成就及其为中国新文学作出的独到历史贡献，由此或可形成对这一作家群体的整体的认知与理解。

(2) 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其总体思路是把百年浙江文学放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研究，揭示其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浙江作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种地位是如何形成的？经过深入探究可以发现，这不仅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开放语境等“外源性”因素有关，更与为研究界所长期忽略的“内源性”文化传统即两浙人文传统紧密相连。其一，“越人”的勇毅性格和丰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赋予了浙江作家勇于以文学承担民族解放重任的独特品格。其二，浙江文化的“务实”传统，让浙江作家率先承担起以文学参与民族改造和社会改造的时代重任。其三，浙地文化先贤从汉代王充以来的“人本”思想，直到明清之际王阳明的平民化思想、个性解放思想，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乃至近代龚自珍、章太炎的启蒙主义思想，为浙江作家从事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平民政义等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建构提供了先天的人文支持。其四，浙地处于南北交通要冲又面海而居所形成的善于容纳各种外来文化的开放、博纳风气，则赋予了浙江作家善于容纳世界文学新潮的品格，导致他们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拓之路上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有容乃大。其五，两浙文化“浙东尚实，浙西崇文”的传统，赋予了浙江作家极为丰富的文化个性和艺术个性，为丰富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风格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之，两浙人文传统所形成的“内源性”力量，不仅成就了独特的“浙江潮”文学现象，同时它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就此而言，我们这一视角的研究，不想只止步于浙江这一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总结，同时，还更想为只专注于外来文化影响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3) 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这是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发展为参照，将浙江启蒙思潮和启蒙文学置于特定的坐标内，考察

其生成背景，展示其演变历程，探讨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意义。目的在于以更为开阔、宏观的视野审察地域文化与文学，同时也在于总结于全局更具观照意义的经验，使地域文学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两浙启蒙思潮分成前近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逐层推进，论述启蒙思潮促进浙江文学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向着近现代方向转型，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的重点是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发展为参照，研究两浙人文传统中富有生气的启蒙文化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着重探讨它对推动整个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意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是从近代文学视角切入，将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部”，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现代化进程，重点关注启蒙文化思潮对于深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学术意义，以更为开阔、宏观的视野审察地域文化与文学，使地域文学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具体内容是在总述两浙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依此阐述：两浙前近代启蒙思潮与文学的近代导向、两浙近代启蒙思潮与文学的近代转型、两浙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力图对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有历时性、全面性的把握。

(4) 地域的文化记忆与想象——20世纪江南散文研究。就地域文学的生成形态而言，散文表达作家情绪、感受的直接性，蕴藉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是所有文体中表露地域文化观念、文化质地最显著、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在解剖两浙文学的具体文学形态时，特选择散文加以研究。这里研究的“江南散文”，是“两浙文学”衍生的概念，其研究范围稍有延伸与拓展，意在从一个局部的文体领域总结出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更具观照意义的经验。研究思路是根据中外哲学、艺术、文化等领域有关“人与地”、“文与地”的理论资源，尤其是两浙地域内历史形成的人文传统及地域景观理论资源，对几种理论资源进行梳理与整合，并结合20世纪江南散文创作及对江南散文中景观的读解与传播的实际情况，研究20世纪江南散文的

发展历程、文化精神、美学形态以及散文中景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情况，由此总结出两浙文学对整体文学的推进意义。研究的侧重点，是试图建构起立足两浙人文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解读、描述理论以及景观散文中景观形象读解与传播的理论，这对于认识江南地域形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的具体内容：是以 20 世纪散文作家的江南城市想象与记忆为逻辑起点，重点选择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六个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 20 世纪散文中的江南城市形象建构以及构建背后的文化意识与审美观念，从而显示散文作家与江南城市之间复杂的“人—地—文”关系。

(5) 对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中的经典作家鲁迅思想与艺术的深层解读。鲁迅无疑是现代两浙文学中最卓越的代表，其引领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性意义已为人们广泛研究与认知，现在还可以切入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缪斯女神”的另类表达式：鲁迅小说诗学结构研究。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在“铁屋子”中发出启蒙声音曾引起强烈的震撼，此种声音的发出源自作家的心灵体验和内心矛盾。自有文字以来，作家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也许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内心有“毒气”和“鬼气”，且生怕这不适宜的“毒气”和“鬼气”传染给读者时，再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曾长期陷于“不可言说”或“无法言说”的尴尬困境不可自拔。最后，鲁迅发现结构并不只是一个沉默的容器，默默无言地承载着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话语，它可以在不动声色中与话语并肩而立承担着表达的重任。于是，“不可言说”的难题才得以破解。基于这种理解，这一视角的研究，将着重探讨鲁迅小说中多种类型的结构，如“铁屋子结构”、“序文结构”、“复否定结构”、“封套结构”、“反比例结构”等，其中重点提出并探讨“智情双结构”。每类结构不仅分别从鲁迅小说启蒙理想、言说困境、读者意识等多维角度予以分析，并且相应结合《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伤逝》、《示众》等经典文本予以论证。

(6) 两浙女性文学：由传统而现代。由启蒙而导致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促成“女性文学”生成、发展与深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在所有文学类型中，“女性文学”与启蒙思潮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紧密。探讨晚近以来两浙地区浓厚的启蒙文化思潮与文学形态形成的关系，选择“女性文学”，便是考虑到其与启蒙思潮的独特关联性。而就女性文学自身成就而言，启蒙思潮促成的两浙女性文学，曾显出相当发达的景观，古代文学中从明末到清代，两浙出现多个女性诗人群，现当文学中的两浙女性作家也颇有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之先者，因此有足够的文学资源可供研究与发掘。中国女性文学历史悠久，到宋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到明清更是蔚为大观，女性作家层出不穷，作品大量涌现。其中两浙女性文学占三分之一，可谓成就卓著。近三百年来，两浙女性文学逐渐从传统向现代嬗变，其妇女观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观念向“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蜕变。与此同时，两浙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逐渐确立，并不断加强。具体来看，清代两浙女性作家开始了艰难的蜕变，她们不愿桎梏在闺阁之内，而努力寻求突破，挣扎于闺阁内外。清末民初，两浙女性作家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胆量和勇气冲出闺阁，走向社会，从而完成了另一次艰难的蜕变。两浙女性文学在嬗变的过程中呈现出群体化现象，其中包括同人化与家族化两种类型。两浙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嬗变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两浙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富裕的地方经济，从而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形成女性作家群的宽松的环境，使两浙女性能够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些，对于促成女性文学的繁盛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上述各个研究角度，均是立足于两浙文学和两浙人文传统，探讨一个特定地域积淀深厚的文学经验，并以此揭示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关系，进而总结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使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不妨说，这样的研究不乏创新之处，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创新意义：一是从人文传统、启蒙思潮视角，对中国文学的两次重大转型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从中总结规律性的经验，就深

王嘉良

化中国文学研究而言是不乏理论创新的。二是研究从一个独特的地域切入，对于整体的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观照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浙江的启蒙文化思潮启动较早，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这里入手，探讨它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意义，把握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途径，可以说是找到了极佳切入口。

绪 言

何谓两浙？所谓两浙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块，江之东为“浙东”，即今天的绍兴、宁波、温州、台州、金华、衢州等地区；江之西为“浙西”，即今天的杭州、湖州、嘉兴、江苏南部（含上海），亦即太湖流域。两浙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最早见于唐朝的“两浙道”。唐肃宗时析江南东道为浙江东路和浙江西路，钱塘江以南简称浙东、以北简称浙西。宋代有两浙路。地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从区域文化角度来讲，“两浙”属吴越文化区域。因此，以历史的维度而言，“两浙”文化亦可以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吴越文化，但主要是指设置“两浙道”之后的吴越文化。以地域的维度而言，由于主要是针对北方文化而言，“两浙”文化又可以称为江南文化。因区域性的生存形态不尽相同，又加以后天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环境，便会产生质地很不相同的文化品格。浙东人和浙西人秉性也有很大差异，群山环抱的浙东之劲直坚硬（土性）与水网密布的浙西之温婉秀美（水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较而言，“浙东”属越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刚性，而“浙西”属吴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柔性。^① 另一种意义上的“两浙”是以富春江为界把今浙江省分为浙东、浙西，两浙即指浙江省。这里取后者。

^① 黄健：《“两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何谓“女性文学”？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指女性作家共同创造的语言艺术世界，即女性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二是指描写女性生活命运，具有一定女性意识的一切文学作品。三是指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体现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品。第一种观点从创作主体出发，认为男女存在天然的性别差异，女作家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会影响到创作风格，她们一般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题材，这是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这种观念也存在不足，即不是所有的女作家的一切创作均具有女性意识。第二种观点从“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出发，不区分创作主体，强调作品的女性意识，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男性作家不具备女性生活经验，“男性模拟性的女性书写”不能等同于“女性书写”。第三种观点是比较通行的看法，然而过于狭窄。笔者认为，所谓“女性文学”是指女性创作的，具有女性意识的一切文学作品。这里排除两类作品，一是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而不具备女性经验的男性作家的相关作品，二是具有女性经验而不具备女性意识的女作家的一些作品；同时把女性文学扩大到女性作家创作的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这就突破仅仅“描写女性生活”的狭隘范围。于是，“两浙女性文学”就界定为两浙女性作家在一定的女性意识支配下根据自己的女性经验创作的反映自己的女性生活乃至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文学，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作品的汇编等。

中国女性文学可谓源远流长，然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明末至民初的女性文学。这一时期创作的女性文学几乎占中国女性文学的三分之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所言：“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数量多，作者众，而作者多集中在江南。在明清江浙女性文学中，两浙女性文学几乎占一半，可以说江苏、浙江平分秋色。由此可见，两浙女性文学在中国女性文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90%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

3500 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①。其中江浙两省，又占 80%。据《历代妇女著作考》所收，江苏省清代女作家有 1425 人，著作有 1707 种。但胡氏所收并不完全，南京大学图书馆史梅女士又辑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收者 118 人，著作 144 种。这样，清代女作家江苏一省就有 1543 人，著作 1851 种^②。现有材料表明，清代浙江省的女作家也不少于江苏省。这样算起来，在清代仅江浙两省就有女作家约 3000 人，著作约 4000 种。^③

我们以两浙独特的自然环境、富庶的经济条件、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运用“社会性别”视角与“历史”视角来考察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两浙女性文学。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两浙女性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以前作为一个阶段，清末民初作为一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称为前女权兴起时期，后一个阶段可称为女权兴起时期。前者以传统儒家的女性规范为参照系，寻求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突破，以便争取最大限度的女性权益。其策略是依托男权社会固有的规范，在其薄弱环节突围而出，并仿效男性谱系而试图建立女性谱系。后者以近现代女权思想为参照系，借助于西方近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借助于天赋人权思想的兴起，女性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自己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其策略是控诉传统愚昧思想对女性的大肆摧残，并借助于男性人文知识分子对女性的高度关注，在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引下提倡男女平等。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② 史梅：《清代江苏妇女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文学评论丛刊》第 4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

^③ 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主要特征》，《文学遗产》2002 年第 6 期。